学習時報

2004年5月3日 第233期

STUDY TIMES

中共中央党校主办 刊头题字:江泽民

国内统一刊号:CN11-0137 国外发行代号:W3970 邮发代号:1-267

第三届创建学习型社会年会将于5月在京召开

年会主题——以人为本 实践科学发展观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牢固树立和全面落实科学的发展观，是深入贯彻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体现，对于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科学的发展观与学习型社会紧密联系，都强调以人为本、系统思考、转变观念、全面发展、协调创新等等。树立和实践科学发展观，能够更好地创建学习型社会；在创建学习型社会中，才能更好地树立和实践科学的发展观。

学习时报社从2001年开始成功举办了两届学习型社会主题年会之后，拟定于2004年5月在北京召开第三届学习型社会年会。本次年会以“以人为本 实践科学发展观”为主题。届时，会议将邀请全国各地的党政领导干部、专家学者、企业家等就科学发展观的内涵，科学发展观与学习型社会的关系，如何运用科学的发展观指导学习型社会创建等问题展开研讨。

参会代表范围：党政机关、地方、军队领导同志；研究学习型社会、学习型组织的专家学者；学习型企业的总裁、董事长、总经理及有关人员；学习型城市、社区、机关代表等。

会议不以提供论文为参会条件，但希望与会单位和代表在可能的情况下提供相关经验资料和论文（同时提供1000字左右论文或资料摘要），届时将评选出50篇优秀论文，并编辑会刊。

即日起开始报名，与会人数限制在150—200人左右。

报名电话：（010）62806227（兼传真）
62805431 62806233

会议时间：5月14—17日

会务费（含餐费） 每人1780元

论文请寄：北京海淀区大有庄100号中央党校学习时报社（邮编：100091）

联系人：韩东娜

E-mail：xxsb5431@sina.com

像任弼时同志那样重视党校的党性教育

中央党校副校长 李君如

今年是为新中国诞生作出杰出贡献的“五大书记”之一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任弼时同志诞辰100周年。我们抱着无比敬仰的心情，深切缅怀这位为党为人民鞠躬尽瘁、英年早逝的，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中发挥过重要作用的卓越领导人。

一

任弼时同志曾经是我们中央党校的领导人，为我们党校的思想政治建设和组织建设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延安时期，为了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推动党的思想政治建设，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十分重视党校工作，采取一系列措施，不断加强对中央党校工作的领导。在1941年12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同志提议，为加强对中央党校的领导，成立中央党校管理委员会，由任弼时、陈云、邓发参加，任弼时为主任，王若飞为秘书；如果军政学院与中央党校合并，谭政也参加管理委员会。同月17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将军政学院合并到中央党校，将在延安的“七大”代表编入中央党校，再从中央机关选调一些高级干部入中央党校学习，1942年1月开学。这次政治局会议还决定，增补王稼祥、洛甫参加中央党校管理委员会。1942年延安整风全面开始后，中央党校是开展整风的五大系统之一。为进一步加强对中央党校的领导，在1942年2月28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讨论通过了关于中央党校的组织及教育方针的新决定：今后中央党校直属中央书记处，其政治指导由毛泽东负责，组织指导由任弼时负责。邓发为校长，彭真为教育长并负责出版学习报。从这些史料可以看出，中央对于办好中央党校是多么重视，任弼时同志对办好中央党校作出了多么大的贡献。

任弼时同志在担任中央党校管理委员会主任期间，在协助毛泽东同志负责中央党校组织指导期间，对于中央党校的教学工作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意见。在1941年12月1日决定他主持中央党校工作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他在发言中提出，中央党校的学员主要招收地委书记以上的干部，要多学些马列主义理论，学会运用理论分析问题，同时学习些实际政策。他还强调，中央党校过去的教员要继续使用，但要让他们理论联系实际，同时应培养新教员。在1942年2月28日，决定任弼时同志负责中央党校组织指导的政治局会议上，中央进一步决定改变中央党校的教学内容和学习方法，停止过去所定课程，在本年内以中央书记处编印的《六大以来》一书为研究内容，学习研究党的路线。在同年4月11日中央政治局讨论中央党校政治教育计划时，任弼时同志提出：党的路线的学习和研究是今年的安排；中央党校学员第二学年要研究中国近百年史、政治经济学；第三学年主要研究党的具体政策。他还强调，要把学习和掌握马列主义的精神实质和方法作为学习方针。学习马列著作，主要是掌握原著的精神实质和思想方法。毛泽东同志对任弼时同志的这些主张和安排很赞成。他在会上指出：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要与中国的革命实际相结合，我们一定要借“箭”，“箭”就是马列主义，过去光读书本，孤立的学习，脱离实际，无法懂得马列主义。这次会议根据任弼时同志的意见，决定由邓发、彭真重新写一个中央党校的总教育计划。任弼时同志这些办学主张，体现了毛泽东同志提出的要把学习理论与学习历史、研究现状统一起来的思想，体现了理论联系实际的科学精神。了解党校历史的同志都知道，任弼时同志这些意见，对党校事业的发展，特别是对党校独特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

任弼时同志还亲自为中央党校的学员上课，解答学员们在学习中提出的疑难问题。他讲课的内容，涉及党的建设和边区财政等广泛课题。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他在1942年7月14日，所作的关于增强党性的长篇报告。

我们都知道，中央政治局在1941年7月1日作出的《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和同年7月21日通过的《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是延安整风前中央作出的关于党的建设的两个重要决定，是开展延安整风的重要准备。中央政治局就党性问题专门形成一个决定向全党提出来，是根据当时抗日战争形势发展的需要，特别是根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因皖南事变而出现的极为复杂的局面，以及党的队伍中在思想、组织和作风上出现的问题所作出的重大决策。毛泽东同志对此非常重视，早在1941年3月19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他就提议任弼时同志写一篇关于党性的文章。在中央发出《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后，任弼时同志就写了《关于增强党性问题的报告大纲》。这个大纲不仅开宗明义提出，“党性的范畴究竟是什么，究竟怎样才能锻炼出和培养成坚强的党性呢？就是说，为了增强党性，需要在哪些方面修养和锻炼自己呢？”而且紧密联系中国共产党所处的社会环境以及由此造成的党的队伍中在思想上、组织上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增强党性锻炼的方向和要求。可以说，这是一篇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好文章，比较好地体现了毛泽东同志从实践中形成的党的建设的科学思想。

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同志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了《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8日，他又在干部会议上发表了《反对党八股》的讲演。这标志着著名的延安整风，经过充分准备全面展开了。任弼时同志在延安整风中承担了大量的工作，包括协助毛泽东同志研究中央党校、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中央宣传部这三个部门的改造工作。但是，当他了解到中央党校的学员在学习研究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等文件时，提出了许多问题，就在百忙之中亲自到中央党校讲课，回答大家提出的问题。这就是他于1942年7月14日在中央党校所作的关于增强党性问题的长篇报告。现在收入《任弼时选集》的，有这个长篇报告的第一部分《为什么要作出增强党性的决定》、第三部分和第四部分中部分内容组成的《反对宗派主义》这两篇重要文献。我们过去研究毛泽东思想和党的学说时，大家都比较重视毛泽东同志的整风文献和刘少奇同志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这是对的。任弼时同志关于增强党性问题的报告大纲和长篇报告，不仅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而且在当年产生过那么大的政治影响，也是我们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学说和党的建设理论的重要文献。我们过去对此重视不够、研究不够，不能不说是我们研究工作的一个不足。

任弼时同志这些重要文献的主要特点和主要贡献是什么呢？

第一，他比较早比较全面地对“党性”这个重要范畴，作了马克思主义的论述。他不仅强调“共产党员的党性，就是无产阶级最高度的阶级觉悟和阶级意识”，而且指出“党性是以党员的思想意识、政治观点、言论行动来作标志，来测量的。”这样的论述，为毛泽东同志创立的“主要从思想上建党”的理论作了重要贡献。

第二，他不仅对党性问题作为一个思想问题作了深刻的论述，而且突出地把它同组织问题联系起来。他指出，增强党性的一个重要任务，是“强调党的统一性、集中性和全党服从中央领导的重要性，强调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都应服从党的中央”。通过思想政治建设来加强党的组织建设，达到党的团结统一，这正是我们党在艰苦的斗争环境中不断壮大自己、克敌致胜的重要经验。

第三，最重要的一点是，他无论在关于增强党性的论述中，还是在报告的风格上，都非常鲜明地体现了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他的报告，不是从概念出发进行合乎逻辑的推理和演绎，而是从实际出发，从大家关心的问题出发，有事实有分析地加以阐述；他回答问题，不是简单地引用中央文件，也不是武断地做结论，而是仔细地、具体地分析党所处的环境、党在自身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和存在的弱点，从中引出科学的结论。他的报告及其风格，显然体现了毛泽东同志所说的从“实事”中“求是”的精神。这种实事求是精神，既是科学性的体现，又是工人阶级政党的党性的要求。也就是说，任弼时同志是通过自身坚持实事求是的模范行动，来宣传党性的。这样的宣传，显然更有说服力，也更有感染力。

三

我们作为生活和工作在21世纪的党校工作者，从任弼时同志办党校的实践中得到哪些启迪呢？最大的启迪，就是党校姓“党”，必须认真学习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必须把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贯彻在党校教学科研的全过程，必须把增强党性放在党校干部教育的首要位置上。

中央党校是培训轮训党的领导干部的最高学府，是学习、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阵地。党校的课程包括哲学、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党史、党建和政治学、法学、社会学、文化学、历史学、国际问题研究等各个学科。但是中央党校与其它高校又不一样，是以培养党的高中级领导干部和理论骨干为主的，是学员进行党性锻炼的熔炉。因此，中央党校名“校”姓“党”。我们的校长从胡锦涛同志到曾庆红同志，反复强调这一点，这是中央党校的最大特点和突出风格。

（下转第二版）

■崇尚宪法 遵守宪法 维护宪法⑤

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

□本报特约评论员 高秦伟

法学家从逻辑的角度写道：“法律的生命在于它的实行”，一部法典制定的程序再如何完美、再如何具有正当性，其内容再如何与社会实际相适应，体系的设计再如何精巧，规范再如何完备，如果该法典不能在社会实际生活中适用或者不能得到贯彻实施，这部法典即是一部死法。这一道理同样适用于宪法。列宁指出：“当法律同现实脱节的时候，宪法是虚假的；当它们是一致的时候，宪法便不是虚假的。”要使宪法真正走向宪政，要使法律同现实相互结合，实行与适用的问题显得尤为重要，可谓如同人的生命一般。

从清末立宪开始，中国并不缺少“纸上的宪法”，但“有宪法而无宪政”曾几何时却成了孙中山等人心中永远的伤逝。新中国成立以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宪法被赋予了很强的政治宣示功能，作为国家根本大法的应有价值和作用没有得到足够彰显，宪法的至上权威也难以确立。改革开放以来，这种状况得到了一些改观。2003年12月，胡锦涛同志在首都各界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公布施行二十周年大会上指出：“实行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首先要全面贯彻实施宪法。这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一项根本任务，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一项基础性工作，要长期抓下去，坚持不懈地抓好。”这表明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宪法的贯彻与实施问题。

任何一个生命都要成长，但任何一个生命成长的路径却并不相同。宪法的实行也是如此。由于世界各国所拥有的知识谱系和话语空间不同，使得各国宪法实行的方式也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但无论如何变化，其中共通之处在于：宪法的生命不仅在于她的庄严，在于她的理性，更在于她的实施，在于她的经验。

在宪政建构与成长方式的问题上，有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的区分，前者是以理性见长，后者则以经验取胜。理性主义要求“合理的政治行动必须建基于对我们的理想国家的相当清楚和详细的描绘或蓝图，还必须建基于通向这个目标的历史道路的计划或蓝图。 理性主义者希望借助自己的理性设计出一整套完善无缺、运行良好的理想制度。这其中必然包括制定一部完善的宪法典。经验主义认为“制度的源始不在于构设与设计，而在于成功且存续下来的实践。”立法可以发现并记载一切，但却不能凭空制造一切，那种希望制定一个详尽无遗的宪政制度，创制出一个崭新秩序的企图是不符合现实的。经验主义者认为法律不在立法而在司法，不在于书面上的条文规定得如何丰富严谨，重要的是法律在现实社会中的运用和实践。如果说理性主义造就了世界宪政国家的不朽构架的话，那么经验主义的作用则体现在使宪政拥有连绵不绝的活力的贡献上。

作为后发型的法治国家，中国的宪法的成长以及宪政的建构应兼采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之长，从整体上推动宪政的建构与发展。任何一部立法都不可能穷尽社会之变化。在行宪过程中，我们既要注重修改宪法的方式，更要注重解释宪法的方式，通过鲜活、开放、渐进的经验促进宪法的成长，从而不断彰显宪法丰富的内涵，为人民提供美好的生活。

归根到底，宪法的生命在于运用。如果宪法不能被运用到生活中去，那么就注定不会有人在乎它，它就永远只能停留在纸上，而非刻在“公民的心中” 只有实行才能使宪法具备持久的生命力。通过宪法的实行，我们最终可以体会到宪政的深邃意旨：规训政府权力与保障公民权利。

■关注点

李振声院士谈中国的粮食安全

□本报记者 范 伟

4月22日，中国科学院原副院长李振声院士在“中国科学与人文论坛”上发表演讲时表示，中国的粮食安全已经到了非常严峻的地步，“粮食生产今年必须回升。”

粮食生产连续五年下降

1998年我国粮食总产达到10245.9亿斤，到2003年减少到8613.4亿斤，减少的数字是相当大的。具体数字是，1999年比上年减了78亿斤，2000年是1011亿斤，2001年是1202亿斤，2002年是1113亿斤，2003年是1641.9亿斤，5年累计减少了5056.4亿斤。再看人口，1998年是12.4761亿，5年连续增长，累计增加了4466万。1998年是人均粮食最多的一年，达到822斤，到了2003年降到666斤。

人均粮食的变化引发一个非常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1960年代初人均粮食大约400斤（1960年是434斤，1961年是448斤）。到1980年代初人均粮食增长到600斤，增长了200斤（1980年与1981年都是650斤）。经过20年的努力，人均粮食提高了200斤。又经过了15年的努力，到1990年代中期达到了800斤（1996年是824斤，1997年是800斤）。我们用了35年的时间上了两个台阶，而1998年以后，又退到600斤的水平。

粮食减产的原因在哪里？

从1952年到2003年，总的粮食播种面积是下降的趋势，可是1998年以后出现急剧下降的情况，其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耕地面积的减少影响到粮食播种面积的减少，另外一个就是其他作物明显的增加。1998年粮食播种面积是170681万亩，此后5年累计减少17345万亩，相当于粮食播种面积减少了10.16%。耕地面积，1998年后5年累计减少了7461万亩，减少了5.2%。其它作物的播种面积5年增加了14140万亩，增加了22.5%。粮食播种面积减少是造成粮食总产下降的主要原因之一。

从粮食单产看，解放以后全国粮食平均单产最高峰是1998年的600.3斤，此后逐年下降，1999年是559斤，2000年是568.2斤，2001年是568.9斤，2002年是586.6斤，2003年是561.7斤。单产降低也是构成粮食总产下降的一个重要因素。

李振声院士认为，粮食减产深层次原因在于粮价低，粮田投入的报酬效率低，农民自然会将较多的农用物资投入到报酬效率高的作物上去，种粮积极性不高，影响了粮食作物的产量。

实现粮食恢复性增长的建议

一是认真贯彻中央支农政策措施，切实调动农民种粮的积极性。今年的一号文件制定了促进农民增收的九项政策措施，其中第一条就是集中力量支持粮食主产区发展粮食产业，促进种粮农民增加收入。两会期间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宣布五年取消农业税和今年中央增拨支农资金300亿元以上等措施。3月底，胡锦涛总书记又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专门研究支持粮食生产的具体措施。现在关键是把这些措施落到实处。

二是尽快恢复可能恢复的粮食播种面积。2003年粮食播种面积比1998年减少了17345万亩，要恢复这么大的面积绝非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三是加大对与提高粮食单产有关措施的支持力度。农用物资的保证供应是提高单产的物质基础，农业技术的推广与普及是实现稳产高产的技术保证。前者政府已经制定了一系列的具体有效措施，而农业技术推广工作目前还存在不少问题，不能适应当前生产发展的需要。据对7省28个县农业技术推广体系的调查，发现普遍存在着投资严重不足，非专业人员多且知识老化，农技推广体制不合理，推广方式不适应市场经济需要，推广政策有缺陷等问题，希望能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



李振声，遗传学家。山东淄博人。1931年2月生。1951年毕业于山东农学院农学系。1990年当选为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中国科学院遗传研究所研究员。曾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

责任编辑：李玉梅
E-mail:Liyumei@vip.sohu.net